

July 2012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lf-Cognitive Mechanism in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1927 Revolution

Guanghai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Guanghai. 2012.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lf-Cognitive Mechanism in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1927 Revolu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4): pp.29-35+7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4/1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小资产阶级原罪意识的诞生、规训与救赎 ——论大革命后左翼知识分子自我认知机制的转型

张广海

摘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话语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左翼文人普遍展开了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与反思。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又直接源于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同时深受中国共产党阶级政策的影响。虽然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受到普遍质疑,其劣根性被广泛强调,但知识分子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路径也存在深刻分歧。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折射出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机制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发生的重要转型。

关键词: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 原罪 规训 救赎

作者简介:张广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研究。电子邮箱:zgh26@126.com

Tit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lf - Cognitive Mechanism in the Left - Wing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1927 Revolutio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mergence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ideology following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1927, left-w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widely engaged into debate and reflection on issues about the petty bourgeoisie. The movement was on the one hand rooted theoretically on Marxist theo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originated from the reflection over the failure of the 1927 Revolu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swayed by CCP's class policy. Petty bourgeoisie's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came to be under question following the failure of the 1927 Revolution, and its original sin was over-emphasized. However, differences existed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ir approaches to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petty bourgeoisie, and these differences reflect the traject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self-cognitive mechanism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1927 Revolution.

Key words: petty bourgeoisie intellectual original sin discipline redemption

Author: Zhang Guanghai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main academic interest is modern Chinese left-wing literature. Email: zgh26@126.com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文坛,小资产阶级问题在中国语境下获得第一次集中探讨。知识分子一般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在其核心必然涉及对自我身份和意识的理解。通过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探讨,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机制发生重要变化,原罪感开始笼罩他们的自我理解,规训与救赎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寻求变得日渐普遍。本文拟以大革命失败后左翼知识分子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和反思为研究主题,透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机制继“五四”后所发生的又一次重要转变。

一、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话语的生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在思想意识及伦

理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人的解放”成为时代潮流,传统伦理观被冲破,意识领域的自主性成为最进步的追求,知识分子更成为独立个性的代言人。但随着革命思潮日渐普及,思想意识的纪律化开始成为192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时代潮流。大革命之后,朱自清曾这样总结了这一转变:“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现的是个人价值。[……]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一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而到了“革命的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372)。左翼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认知和定位,遂由追求解放的自主个体,渐变至寻求

自我规训的“小资产阶级”。大革命失败后,伴随着对革命失败原因的检讨,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在文坛迅速崛起,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普遍展开了对自我身份的反思。

在阶级革命话语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常存在双重分类标准。一般来说,他们会被视作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由其在现代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但由于他们又常被视作意识形态的代表阶级,所以其阶级身份又难免依据思想状况而游移(麦克莱伦184)。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因此也习惯于把知识分子划归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类型,这时,分类的标准便由生产方式转变为思想意识。比如苏俄文化干部列列维奇便曾把文坛派别定义为“资产阶级文学”一派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同路人”一派(6-7)。通过这种分类,知识分子的革命或反动程度获得界定。不过,由于思想意识的不确定性,有时对某些知识分子是该归入哪一类,并不容易确定。革命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成仿吾在评论语丝派时就说“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5)。到底属于哪个阶级,并不让人十分明了。创造社的郭沫若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分也未在意,比如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一边说“文艺青年们的意识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一边又说“我们同样的从小有产者意识的茧壳中蜕化了出来”(麦克昂,《留声机器的回音》2-4)。但这也并不难理解,除非在强调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场合,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并不会有什么差别。小资产阶级,宽泛来讲,也难免是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被认为没有专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论系统性的思想或意识难免附属于其它阶级。

正因为以思想来划界充满不确定性,更通行的做法还是依据物质出身和特定的意识状态(“根性”)把知识分子统一视作“小资产阶级”。不过不管依据什么标准,小资产阶级文人还是可以被公认为知识阶级的主体。大革命失败后,倾向于革命的文人大都认为革命的失败源于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的劣根性发作;在中共的革命政策中,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也被认为丧失了革命性,从而被从革命队伍中排除(杨奎松175-89)。受此影响,左翼文人开始了重点检讨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危害性,并展开猛烈批判。小资产阶级文人的原罪意识于是开始被重点强调。

郭沫若虽然对资产阶级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区分未加措意,但大体上还是认为知识阶级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统治,以至于认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重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麦克昂,《桌子的跳舞》7)。可见,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在政治上即意味着反革命。虽然小资产阶级也有革命性,但显然并非“根性”。即是说,小资产阶级是个具有原罪的阶级,

其出身即是不洁的,“根性”即为“劣根性”。认同阶级革命理论的作家,罕有人不持有类似的认识。成仿吾曾论断“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但是在对于资产阶级(bourgeois)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4)。但这种论述大体从属于提高前期创造社地位的意图,不能太当真。在同一篇文章最后,他呼吁文艺作者“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获取辩证法的唯物论才更能代表自己的当下想法(成仿吾7)。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是什么呢?成仿吾以知识阶级为例做了说明,要言之,即踌躇不决、无行动力、无责任感。“《波浪》描写革命时期的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踌躇不决与对于目前一切的不满。这是不觉悟的小有产者最困险的通病。他们对于外界一切的现象不满,但是又没有决心自己去干。不去革命吗,又觉得不可;去革命吗,又觉得目前的一切都不如意。于是对于什么都是Laissez-faire[放任主义——引者],责任到了身上时,就只有一走了之。[……]不把这种成分克服,知识阶级是不能遂行他的历史的任务的”(厚生123)。

太阳社的钱杏邨则以鲁迅为例对小资产阶级“恶习性”做了批判。在他看来,鲁迅不能跟上时代即源于其小资产阶级根性的作用。“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我们是在在的可以看得出来。”鲁迅所以寻不到出路,正因为“是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害了他!其实,具有这样习性,而葬送了他们的一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钱杏邨11)。

说到小资产阶级的习性,革命文学作家姚方仁(姚蓬子)的概括或许最为全面“虚荣,彷徨,畏怯,偷巧,浅薄,贪闲一时,无责任心,意志薄弱,纵欲[……]”。另一位革命作家孔另境则对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有更系统的认识:

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怎样的呢?总说一句是懦弱而犹豫。因为它的经济地位是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它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它的意志往往以它的利害为前提,如果资产阶级给它一点利益,它就会帮助资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如果无产阶级给它一种刺激,它就会同情于无产阶级。不过唯物史观所昭示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总是资产阶级的附庸。(153)

这便清晰不过地揭示了小资产阶级文人在道义上的趋炎附势性。即便他们投身革命,也是出于现实“利害”的考虑,难改“附庸”本性。孔另境因此特别强调了克服作家“小有产阶级的意识”的“思想改造”必要,并设计出一揽子规划(147-48)。

对于改造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左翼革命作家大都十分重视。后期创造社主力成员朱镜我重点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扫除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艰巨性“比打倒大的集中了的布尔乔亚还千倍万倍还困难的是数百万数千

万的小所有者底劣根性,在过渡期内是不能一举扫净的,但不能一时地去扫净,而且这小商品生产者以小布尔乔亚的空气包围普罗列塔利亚,使它腐化,使它颓废起来的,所以,普罗列塔利亚特有牢守严格的阶级的规律而向小布尔乔亚做顽强的欺蒙的斗争之必要”(29)。虽然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事情,但无疑,在专政之前这种斗争也绝不可少。

左翼革命作家对小资产阶级恶劣根性的攻击,是他们理论批判话语中重要的内容,而且也取得了十分理想的传播效果。后来,反对普罗文学的梁实秋便把他们所取得的最大战果归诸这一方面。^①

二、对小资产阶级身份的忏悔及对规训方式的探求

小资产阶级身上既具有如此严重的劣根性,知识分子又从属于它,这对真诚信仰这样一种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除非能给自己的思想意识寻找到一个更高的安置点,很难不对自己的阶级身份充满忏悔之情。冯雪峰写于1927年的一首题为《小资产阶级》的诗,便是对这种忏悔之情的坦率表白。“小资产阶级这名词,近来是屡次的挂在我们的嘴了。/我们无疑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这名词又带着怎样可耻的毒刺呵……/有一回,是喝了一杯白干之后, /不知为什么,我说J是小资产阶级了; /J是即刻满脸进红着, /拍着桌子道‘你侮辱了我了;’ /而且虽经了百般的解释, /J还说,要不是我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他定是和我打架了——/这名词是带着怎样可耻的毒刺呀。//我们无疑都是小资产阶级。/就这样,这可咨(恣)骂的,使人赧颜的名词, /是屡次挂在我们的嘴上了。”(S. F. 105-07)小资产阶级身份的耻辱性于诗中尽显。不过从起首的“近来”来看,对小资产阶级身份的忏悔,也是较新鲜的事物,其普及开来,还要归功于大革命对革命理念的深入传播。而中共采取的认为小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从而大力贬低小资产阶级革命潜能的政策,对知识阶级忏悔自己的阶级身份应该也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在冯氏名文《革命与智识阶级》中,他对那些既向往革命、又徘徊而痛苦的革命同路人(自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深切同情,和他的自我认识是分不开的;而被冯雪峰视作这一类型知识分子代表的,便是鲁迅。他对知识阶级——即便是“革命的知识阶级”——只能成为革命的追随者的认识,更是和革命文学派所宣扬的知识阶级引领革命的观点完全相反。因而在他看来,创造社的行为只能是“狭小的团体主义”(画室43-51)。

那么,鲁迅又是如何体认自己的阶级身份的呢?在1927年11月所做的讲演《关于知识阶级》中,鲁迅以一种充满张力的叙述,把知识分子的缺点和所应具有的精神

做了呈现。他首先借俄国的情形说明知识阶级应“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在这里,评价知识阶级的标准在于是否站在平民的立场。然而因此也将暴露知识阶级的第一个缺点:一旦他们在民众拥戴下地位上升,难免“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和“平民的敌人”。知识阶级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思想将影响集体行动的力量。“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鲁迅,《关于知识阶级》224-25)。

可注意的是,在鲁迅的论述中隐藏着许多他自己未进一步提出的问题,而它们将直接影响到他对知识阶级的价值期待能否自洽。比如,正因为平民的利益取决于集团的存亡,知识阶级是否应该为了平民的利益而出让自己的独立性?集团为了自我生存从而压制知识阶级又是否正当?鲁迅未对这些给出答案,而是接着论说了真知识阶级的特性: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关于知识阶级》226-27)

既然如此,判断知识阶级的标准便内在分裂了:是永远站在平民的一边,还是永远“不顾利害”、坚持自我的独立性呢?鲁迅或许忘记了他早年对“个人”和“众数”关系的辨析,或者竟可说,追求个人自由的早期鲁迅和追求平民立场的晚期鲁迅发生了分裂。鲁迅并没能真正解决这种分裂,他以自己的方式回避了它:他寄望于一个新社会能够弭平这一分裂。新旧社会的差别同时也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别。旧社会的知识阶级不顾“利害”,“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执拗性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而在新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得知识分子可能和集体取得一种和谐的状态,个人主义渐变至集体主义——他没有什么可以反抗的了,从而取消了自己“痛苦”阶级的命运。“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鲁迅,《关于知识阶级》227)。

坚守这种新旧之别,便需要让知识阶级变成行将灭亡的旧的“痛苦”阶级;通过让知识阶级感觉到痛苦、通过让他处于新旧交替的中间状态,个人主义找到了过渡到集体主义的路径,二者于是获得新旧混杂的存在形态。这种存在形态,以坚守个人意识的真诚性为原则,它集中体现在已跨入“大时代”的苏俄的叶遂宁、梭波里等人身上。虽然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当下的关系,仍然未能解决;但它同时获得了解决,——方法便是死亡,这批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知识分子必然的死亡。正是苏俄的成立

让鲁迅看到了问题解决的曙光,并给了鲁迅以安慰。

叶遂宁和梭波里的命运是鲁迅在倾心苏俄之后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这无疑牵涉到鲁迅的自我理解。在鲁迅的论述中,一方面肯定他们坚持自我的真诚性,同时指出,正是这种真诚性使得他们在新时代面前无所寄身,只能选择自我毁灭:

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能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命运;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在钟楼上》36)

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21)

在鲁迅看来,虽然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过渡,是旧知识分子向新知识分子转变的必经之途,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内在一致的真诚性作为“桥梁”:

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终于,则甚至闪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间为惟一的现实一流的阴影。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150)

鲁迅又曾指出“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209)。其实所谓“旧性荡涤不尽”正是新旧交替期知识阶级的共通属性,也正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现实与历史命运。面对“旧性”,需要的是救治——虽然痊愈为新人不可能,但对自己没落命运的挽救意味着对自己及历史的负责。

鲁迅找到了救治自己的方式,那就是“自啮其身”,使用唯物史观的“天火”烹煮自己: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

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213-14)

鲁迅不能对论敌的解剖和咬嚼感到满意,他选择了自我“解剖”和“烹饪”,借用从别国窃来的火,以便更透彻地自我理解。“咬嚼者”虽也可借此有所裨益,但这种裨益来自于个人主义的“报复”。而对“个人主义”出发点的强调,既是对自己“旧性”不能除尽的声明,更是在真诚性意义上的一种自矜表达。需要对自己做这么一番深入骨髓的救治,前提是对自己沉痾和“罪”性的认识,唯物史观的治疗和救赎已迫不及待。

可以说,冯雪峰和鲁迅分享着一种在革命面前谦卑的知识分子观,而在这背后,是对自己以及整个知识阶级“罪”性的认识。这种罪性,在冯雪峰那里集中表现为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在鲁迅那里,则集中表现为一种更有深度的“中间阶级”历史罪性;而所谓中间阶级,其实也正是小资产阶级的别称。^②

另一位对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怀有深切认同感的是郁达夫。在大革命后期,郁达夫对革命前途屡次表示了担忧,原因正在于小资产阶级领导者劣根性的必然发作。他因此得出结论“真正彻底的革命,若不由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是不会成功的”(《归》46)。在郁达夫看来,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同样表现在不具有体验工农感情的能力上,因此发展为他们文学创作上的局限“曾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我辈,是决不能作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否认的”(《归》46)。

正因小资产阶级具有如此难以克服的劣根性,所以不论小资产阶级自身、还是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者,都难免提出种种规训的计划,以便克服之,使其朝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起码不成为进步的阻碍。就如朱自清所恳切忏悔的“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374)。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方面的探寻日渐普遍,而最响亮的便是号召小资产阶级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从不当留声机器到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呼吁。太阳社的蒋光慈即指出,真正的出路在于由个人主义进至集体主义:“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心,渐由个人主义趋向到集体主义。[……]现代革命的倾向,就是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革命的倾向是如此,同时在思想界方面,个人主义的理论也就很显然地消沉了”(10)。

到郭沫若那里,善用譬喻的他马上拈出“留声机器”这一鲜明形象“文艺青年们应该做一个留声机器——就

是说,应该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留声机器的回音》2)。对集体主义的呼吁顿收点铁成金之效,生动了许多,也获得了更理想的传播效果。^③

虽然克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呼声响彻云霄,甚至获得知识阶级十分广泛的认同。但也并非所有有此认同的知识分子都决定洗心革面,投身无产阶级的革命阵营。比如朱自清,虽然也深切忏悔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并决意有所克服;但他只能自信不在积极的意义上“反革命”,而深知不能走向革命的道路。朱自清打算固守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执拗“我是走着衰弱向灭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样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376)。于是在对小资产阶级近乎完全负面的界定当中,朱自清寻找到了自我坚持的力量;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对小资产阶级根性的过分强调,必将导致一种宿命论式的自我坚持——自己确实并无革命的意志与力量,而彻底难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我在 Petty Bourgeoisie 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 Petty Bourgeoisie 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浹髓是 Petty Bourgeoisie 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朱自清 374-75)。

朱自清给自己的坚持蒙上了太强的悲观色彩,这和小资产阶级的形象被过分负面化有直接的关系。在革命的理论体系中,小资产阶级并不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只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徘徊犹疑,不革命则变为反革命。即是说,小资产阶级并无主体性可言,而只是一个依附和寄生阶级。不过,在朱自清的坚守中,已经可以看出一种较为有意识地赋予小资产阶级主体能动性的尝试。

茅盾也对小资产阶级给予了特别关注,表达出他对发挥小资产阶级主体性的强调;虽然其意图也在于引导小资产阶级为革命服务,但仍然导致被革命文学家大力批判。到了1933年,已经脱离了中共的前太阳社成员杨邨人,宣布认同“第三种人”,撰文《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意图高调张扬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自主阶级的特性“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无论怎么样改头换面自欺欺人也不像无产阶级。我们只能做我们所能做到的工作,我们不愿意伪善骗人去作那只有空架子的事”(623)。

杨邨人等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张扬必然地遭到了“左联”作家的严厉批判。在左翼作家激烈的批判声浪中,已是“左联”领导的茅盾虽也曾匿名作文讥讽,^④但大体选择了回避,并在私下对人讲“排斥小资产阶级作家,‘左联’就不能发展,批‘第三种人’的调子,和过去批我的《从牯岭到东京》差不多”(夏衍 142)。

三、阶级意识理论对小资产阶级身份的救赎

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在输入中国的时候,曾包含专指社会运动领导者的意义。比如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便认为知识分子的涵义包括指“指导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即指现在居于工会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之指导地位,而没有从事于肉体劳动者,如马克思,恩格斯等,皆属于此类之知识分子”(高希圣 337)。据此则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知识阶级作为小资产阶级存在,十分符合后来革命政权的设计。但知识分子的这一涵义并未能被广泛接受,在一般理解中,仍然把知识分子和知识阶级等量齐观,知识分子并未能够成为一个特殊的革命领导阶级。

然而在实际上,知识分子当中确实在不断分化出革命的领导阶层——一个近似于“牧师”的阶层。它一头联系着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头联系着背负原罪的小资产阶级,负责把后者救赎到前者那里去。这种末世救赎论的景观便集中体现在了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灌输理论里,只不过在其中,作为上帝而存在的并非实际的无产阶级,而是理想状态的无产阶级——以阶级意识的占有为标志;而阶级意识又只有革命的知识阶级才有能力去发现。一旦跻身于获取了纯正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行列,则便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断绝了关系,而且获得审查他人阶级意识纯洁度的资格。

李初梨在论述无产阶级文艺时,格外注重强调它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前锋的文艺,而前锋的意识截然不同于无产阶级自然生长的意识。革命的前锋——知识阶级——拥有比无产阶级更加先进的属性,并且完美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无产阶级因为生活与思想都局限于物质的生产过程之中,反倒身上有着种种“劣根性”:他们把“一分一文”,看得“要比全社会主义全政治还有价值”,他们只“为自己及自己的儿女,却不能为未来的 generation 斗争”(李初梨 11)。他们只能自然生长生出工团主义的反抗意识,“还没有意识着现在的社会制度对于他们的利益底不可和解的冲突,而且他们也不能意识”。而革命的知识阶级能够实现全生活的批判,革命成功的希望也在于那些资产阶级中“理论地能够了解全历史运动底布尔乔亚思想家的一部分,投到普罗列塔利亚里来了”,并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灌输给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李初梨 10)。

后期创造社其他主力成员对这种阶级意识灌输论也多有强调。^⑤这样来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被成功分割成至少两个部分。不过这种切割并没有做到十分清晰。这又涉及到两个界限模糊的概念的区分,即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n,无产者)和普罗列塔利亚特(proletari-

at,无产阶级)。后期创造社曾专门对这两个概念予以界定,前者指具体的无产者,后者则指一个集合的“阶级”(《新辞源》101)。一般来讲,这是两个难分彼此的概念,而后者包含前者,但对于以阶级意识理论为号召的后期创造社则并不完全如此。他们分别赋予了这一对概念以不同的涵义,大体来说,无产者处于不完美的现实界;而无产阶级则既可能被理解为处于现实界,又更经常地被理解为一个处在非现实界的集合体。因此,无产者及其意识都是不完美的,甚至无产阶级也可能不完美,但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一种理想型的完美意识,即创造社反复强调的“阶级意识”。比如朱镜我曾论说道:

我们现在的无产者大多数还没有获得无产者应有的社会认识,这是事实,因为我们的无产者一方面为“无知”所苦,他方面还受传统思想的麻醉太深……但是,普罗列塔利亚特,尤其是他的先锋,因为他的社会关系上的特性,自有他的透彻的社会认识;这是布尔乔亚与小布尔乔亚所容易看过的。(惹 135-36)

通过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的区分,朱镜我便视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及其先锋,而“大多数”无产者都还不能属于普罗列塔利亚特,因而普罗列塔利亚特的主体将是革命的知识阶级。这虽然显得夸张,但从中确实可以看出朱镜我把革命的知识阶级归属于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努力。想必朱镜我也意识到了这一论述所隐含的夸张性,于是接着说“小布尔乔亚领导革命是很危险的。不过不问是小布尔乔亚,或是普罗列塔利亚,要紧的是要获得普罗列塔利亚的社会意识”(惹 136)。

这似乎承认了知识阶级的小布尔乔亚身份,只不过立即又声明“社会意识”(或说阶级意识)才是最关键的衡量标准,表明获得了无产者“社会意识”的小布尔乔亚知识阶级,并不比无产者不足取。应该说,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理论确实提高了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它的意图并不在于赋予小资产阶级一种具有主体性的生活,而同样在于彻底摧毁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及精神世界。它重视的并非小资产阶级总体,而只在于把其中的一部分挽救出来,涤除这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原罪,以使其负有引领革命的资质。

于是,一部分革命的知识阶级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阶级,他们需要负责对不能自然开化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灌输工作;另一部分知识阶级则身负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的原罪,他们同样需要上一类知识阶级灌输给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主动加强思想的改造。后一类知识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当然也存在,无产阶级获得阶级意识虽然靠的是灌输,但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习得过程;而知识阶级获得阶级意识的过程则意味着漫长而曲折的思想改造,他们需要在无产阶级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不管是否“现实”的、必定是理想的)

中获得净化,以避免痼疾的反复发作。

结 语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认同无产阶级革命路径的时人对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根性的认识几乎并无根本分歧,作为无可逃避的小资产阶级成员,各方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破解小资产阶级对自身属性的规定,但具体的反思和“破解”路径则难免大相径庭。或者“执心自食”、深切忏悔,寻求救赎之道;或者在小资产阶级中抽离出无产阶级的代表阶级,负责向其他各阶级灌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督促和指导小资产阶级克服劣根性;或者竟在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面前半“缴械投降”,自认没落的命运,但自信还有着不走向反动的意志,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所以干脆以“小资产阶级”互相号召。不过虽有这些差异,克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要求则几乎是共同的呼声。固然有理论认为,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并获得无产阶级的代言资格,便有可能完美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但对绝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小资产阶级的身份始终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在“罪”感中挣扎成为他们普遍的生存状态。正因此,克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思想改造”要求与其说来自外部,不如说发自肺腑。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忏悔,开始成为此后几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注释 [Notes]

- ①参见梁实秋“普罗文学哪里去了?”,《梁实秋文集》第7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
- ②可参拙作“论何谓小资产阶级及其与知识阶级之关系——一项从民国辞书出发所做的考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2012),即刊。
- ③进一步论述参见程凯“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后期创造社“意识斗争”的多重指向与革命路径之再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2006):28-53。
- ④矛盾的匿名作品为“第三种人的去路”,发表于《文学》1.4(1933):501-02。
- ⑤参见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新月的态度》底批评”,《创造月刊》1.12(1928):1-9;王独清“文艺上之反对派种种”,《澎湃》1(1928):3-5;克兴“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革命文学底根本问题底考察”,《创造月刊》2.2(1928):115-25。这一理论主要来自列宁的著作《怎么办》。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

- (1928): 1-7.
- [Cheng, Fangwu. "From Literary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Creation Monthly* 1.9 (1928): 1-7.]
- 高希圣等编《社会科学大词典》,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
- [Gao, Xisheng, et al. eds. *A Grand Dictionar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World Book Company, 1929.]
- 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无轨列车》2(1928): 43-51。
- [Huashi(aka. Feng, Xuefeng). "Revolution and Intelligentsia." *Trackless Train* 2 (1928): 43-51.]
- 厚生(成仿吾):“编辑后记”,《创造月刊》1.11(1928): 123-24。
- [Housheng(aka. Cheng Fangwu). "Afterword." *Creation Monthly* 1.11 (1928): 123-24.]
- 孔另境“时代文学的修养”,《文化批判》5(1928): 146-56。
- [Kong, Lingjing. "The Training of Times' Literature." *Cultural Critique* 5 (1928): 146-56.]
-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2(1928): 1-13。
- [Jiang, Guangci. "About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Sun Monthly* 2 (1928): 1-13.]
- Г.列列维奇“关于对资产阶级文学和对中间派的关系”,雷光译,引自《“拉普”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Lelewicki, Г.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Bourgeois Literature and Centrists." Trans. Lei Guang. *A Collection of RAPP's Sourc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1.]
- 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月刊》2(1929): 1-20。
- [Li Chuli. "The Spontaneity and the Consciousness." *Thoughts Monthly* 2 (1929): 1-20.]
- 鲁迅《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Lu, Xun.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Ye Yongzhen's *As Short as a Decade*."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Vol. 4.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关于知识阶级——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 "About Intelligentsia: A Lecture in Shanghai Labor University on Oct. 25."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Vol. 8.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 " 'Straight Translation' and 'the Class Nature of Literatu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Vol. 4.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 "On the Bell Tower: Nocturnal Notes No. 2."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Vol. 4.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 "The Wrong Turn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 Lecture in Shanghai Jinan University on Dec. 21."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Vol. 7.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第3版)》,郑一明、陈喜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McLellan, David. *Thoughts of Karl Marx* (3rd edition). Trans. Zheng, Yiming, and Chen, Xigui.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麦克昂(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文化批判》3(1928): 1-12。
- [Mike-ang(aka. Guo, Moruo). "The Echo of Gramophone: an Examination of the Attitude Literary Youth Should Adopt." *Cultural Critique* 3 (1928): 1-12.]
- :《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1.11(1928): 1-11。
- [———. The Dance of Desks. *Creation Monthly* 1.11 (1928): 1-11.]
- “新辞源”,《文化批判》1(1928): 98-102。
- ["New Etymology." *Cultural Critique* 1(1928): 98-102.]
-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3(1928): 1-24。
- [Qian, Xingcun. "The Dead Age of Ah Q." *Sun Monthly* 3 (1928): 1-24.]
- S. F.(冯雪峰):“小资产阶级”,《无轨列车》3(1928): 105-07。
- [S. F.(aka. Feng, Xuefeng). "Petty Bourgeoisie." *Trackless Train* 3 (1928): 105-07.]
-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 [Xia, Yan. *Random Searches into Old Dream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 杨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2.4(1933): 623-25。
- [Yang, Cunren. "Flying the Flag of Petty Bourgeoisie'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Modern Times* 2.4 (1933): 623-25.]
-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

“零距离”恰恰相反,它显示为主体对其所从事的学科根基的文化认同,虽已如血脉贯注身心,但因缺乏外界高压,他又懈怠于将其学养外化为研究对象。他更愿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无牵无挂地活在其学养所植根的那片故土,生于斯,长于斯,醉于斯。这就无所谓“学术距离”,也就怠慢学术了。

揣测本书作者,当心仪于斯。近获作者新词《渔家傲》,分明透露了这一信息:“百岁年光知有限,沧桑轮转须臾变。回首浮尘横醉眼,长闲散,先生无事多欢宴。美酒一杯诗一卷,笙歌唱彻三更半。晓梦醒来还呼唤,秦淮岸,昨天已约今天见”。

或许有人会问:那他又为何要出版其《古典文学论丛》?这让笔者想起康德的一句话,说著作应是思想者人生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作者来讲,恐不见得。我想,若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两句晏殊词来推测作者的出书情结,恐不无理由。

理由一,拟将“花”来隐喻作者的逝水年华,委实难免惆怅:作者何尝不知凭其聪慧及博闻强记去埋头治学三十年,其硕果定将八倍、十倍地接踵问世;然他又须有平常心,既然要了“文人情性”的好处,他也就得会心于那句他极为认同的拿破仑格言,说安逸将磨损一个人在艰难时世所立下的庄严誓言。此即“无可奈何”。

理由二,“燕”在此又象征作者专攻词学史案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抚今追昔,仍温温然、莹莹然有泪花噙在眼角。那是心灵的自我抚慰。是的,出这本书,至少能印证那句俄国民谚不错:

尽管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
但鸡永远飞不到鹰这般高。

注释 [Notes]

①本文系周圣伟《古典文学论丛》序言,该书即将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查正贤)

(上接第35页)

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Yang, Kuisong. *The Revolution in "Intermediate Zone": on CCP's Key to Success in An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姚方仁“文艺与时代”,《文学周报》339(1928)。
 [Yao, Fangren. "Literature and Times." *Literature weekly* 339 (1928).]
 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北新》2.19(1928):39-47。
 [Yu, Dafu. "Attitudes to the Society." *Beixin* 2. 19 (1928): 39-47.]
 日归(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洪水》3.26(1927):45-47。
 [Yuegui (aka. Yu, Dafu).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and Proletarian Literature." *Flood* 3.26 (1927): 45-47.]

恁(朱镜我):“普罗列搭利亚特意识的问题”,《文化批判》3(1928):135-36。
 [Zhe(aka. Zhu, Jingwo). "The Problem of Proletariat's Consciousness." *Cultural Critique* 3 (1928): 135-36.]
 朱镜我“德模克拉西论”,《文化批判》5(1928):17-30。
 [Zhu, Jingwo. "On Democracy." *Cultural Critique* 5 (1928): 17-30.]
 朱自清“那里走——呈萍野火栗四君”,《一般》4.3(1928):368-84。
 [Zhu, Ziqing. "Where to Go: for Ping, Ying, Huo, Li." *Yiban* 4.3 (1928): 368-84.]

(责任编辑:王嘉军)